



创于1897

《雅》《頌》與出土文獻新證

鄧佩玲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雅》《頌》與出土文獻新證

鄧佩玲 著



2017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雅》《頌》與出土文獻新證 / 鄧佩玲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ISBN 978 - 7 - 100 - 14062 - 1

I . ①雅… II . ①鄧… III . ①出土文物—文獻—研究
—中國 IV . ①K877.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32676 號

權利保留，侵權必究。

《雅》《頌》與出土文獻新證

鄧佩玲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4062 - 1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開本 880 × 123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10 1/2

定價：38.00 元

序　　言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今日所見《雅》《頌》存詩 145 篇，篇幅佔《詩經》全書過半。惟經歷代傳抄，間或致訛誤衍脫，釋讀頓生懸疑；兼且《詩》之用辭原多古奧深晦，皮錫瑞、王國維諸先生皆曾有《詩》難讀之歎。雖云如是，論述《詩經》著作歷代不輟。近年新出土文獻多見與《詩經》相關材料，學者每取與傳世古籍互證，勝義紛陳，蔚然可觀。

本書利用新出土金文及簡帛文獻與傳世古書彼此參校，並藉助“二重證據”或多重證據之相互證明，結合古文字學研究成果，從多角度探討及試圖解決與《雅》《頌》相關之疑難問題，所涉範疇包括文獻、訓詁、語法及史學等，為《詩》學研究注入新思維、新視野及新見解。茲就其要者，例舉如次：

第一，對近年出土文獻中《詩》類資料做全盤搜集與整理，揭示與傳世詩學研究範疇間之互動關係，復疏解新見《詩》學材料，為古文字之考釋及文獻通讀提供重要參考，展現廿一世紀最新之學術訊息與潮流。

第二，利用新出土第一手材料，為前人研究成果輔以新證，並對久懸未決之學術討論提供新見，如：

(1)《詩》與音樂及舞蹈之關係向為學術界所關注，然礙於相關資料不足，對此課題之探究相形欠缺。本書藉助清華簡材料，深入分析先秦樂舞《大武》之結構，並就過去於“始”“亂”之討論有所發明。

蓋前人討論大多忽略《大武》蘊含之德治思想，本書結合戰國戈銘，細加闡釋《大武》“武德”及其嬗變軌迹。至於朱熹、顧炎武等嘗有“變風變雅不入樂”之說，今藉由清華簡《芮良夫毖》之分析，為變《雅》是否入樂別出新說。

(2)《雅》《頌》文辭古奧，經歷代傳抄，間或遭改乙，釋讀益見困難。本書藉助金文與《雅》《頌》字詞之互證，就部分疑難詞語提出新訓釋，甚至解決部分疑似訛誤句例，為《詩經》研讀增添新資料。

(3)前人對古漢語中無實義之虛詞稍欠瞭解，注疏對語助詞亦往往有所誤釋。本書結合金文與《雅》《頌》之“不”“無”用例，論證“不”“無”於先秦確曾用為語助詞，更訂前人訓釋之疏漏，從而釐清“遐不”與“不遐”之確實語義，並利用金文與《詩》用例對照，論證“其”於先秦亦兼具語助詞用法。

辛卯歲(2011)，佩玲首部學術論著《天命、鬼神與祝禱：東周金文嘏辭探論》付梓前夕，余承長者嚴命，勉力為序，嘗稱“她天資聰敏，勤奮有加，還有一份獨特的執著和堅毅不屈的精神……教學之餘，仍孜孜不倦，致力於學術之鑽研，並且與時俱進。”果爾，時隔五載，佩玲復再度索序，余於《詩》學，涉獵未深，惟感其勤且誠，乃厚顏就書中所見以為記，蓋亦道實而已耳！

張光裕

丙申暮春三月於淡煙疏雨樓

目 錄

第一章 《雅》《頌》與出土文獻引論	1
第一節 《雅》《頌》概說	1
(一) 《雅》《頌》的創作年代與內容	1
(二) 《雅》《頌》與“詩六義”	5
(三) 《雅》《頌》與音樂、舞蹈的關係	10
第二節 《雅》《頌》與出土文獻的互證研究	29
(一) 從“二重證據法”到“重寫學術史”	31
(二) 新見《詩經》版本與《詩》學資料	37
(三) 金文材料與《雅》《頌》研究的關係	55
第二章 文獻篇——藉助出土文獻解決《雅》《頌》的文獻問題 ...	61
第一節 《大武》樂章的“武德”思想與戰國戈銘“大武闢兵” ...	61
(一) 《大武》與“告成”之關係	64
(二) 《大武》與“武有七德”	68
(三) 《大武》“武德”於春秋戰國時期之嬗變	75
(四) 戰國戈銘“大武闢兵”與“武德”之關係	80
(五) 小結	97
第二節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於《大武》樂章的啟示	101
(一) 《大武》“六成”研究之回顧	101
(二) 上古樂章的計量單位——“成”與“終”	106

(三) 《大武》樂舞的創作時代	113
(四) 《大武》樂章的結構	116
(五) 小結	128
第三節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所見誠勉詩與 《雅》《頌》的樂舞性質	130
(一)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非天誼惠”之勸諫	130
(二) 清華簡《芮良夫毖》所見之諍諫	144
 第三章 字詞考釋篇——《雅》《頌》與出土文獻字詞互證舉隅	171
第一節 《周頌》祝嘏辭	172
(一) 《維清》“迄用有成”及《臣工》“迄用康年”	177
(二)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	190
第二節 《周頌》重言詞語	199
(一) 恭敬威儀之形容——“濟濟”“穆穆”“肅肅”“桓桓”	200
(二) 和諧樂聲之形容——“喤喤”與“將將”	208
(三) 重言之歎詞——“嗟嗟”	218
(四) 旂與鈴之形容——“陽陽”“央央”	223
(五) 小結	228
第三節 《雅》《頌》所見“將”字	231
(一) 歷代經學家於《雅》《頌》所見“將”的訓釋	231
(二) 殷周金文所見“將”及其相關字形	244
(三) 其他古文字材料所見“將”及其相關字形之演變	253
(四) 藉助古文字重新分析《雅》《頌》所見“將”	264
(五) 小結	272

第四章 虛詞篇——《雅》《頌》與金文所見語助詞“不”“無” “其”的探討	274
第一節 歷代經學家對《雅》《頌》所見語助詞“不”“無”的 訓釋	274
(一) 毛《傳》“不/無 A,A 也”的訓釋與其影響	276
(二) 毛《傳》“不/無 A,A 也”實非反詰辨	280
(三) 杜預於“語助”的提出與清儒的肯定	282
(四) 從語法角度看《雅》《頌》的語助詞“不”“無”	289
(五) 《小雅》《大雅》所見的“遐不”“不遐”	293
第二節 禿器銘文中“其”的語助詞用法	311
主要參考書目	320
(一) 古籍	320
(二) 近人著述	322
後記	326

第一章 《雅》《頌》與出土文獻引論

第一節 《雅》《頌》概說

《詩經》，又稱《詩》或“詩三百”，乃我國首部的詩歌集。今本《詩經》收錄詩篇共 311 首，但其中之《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均有目無辭，被稱為“笙詩”，^①故現今所見之《詩經》實有詩 305 篇，分為《風》《雅》《頌》三類。《風》收錄詩篇共 160 首，分“十五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雅》存詩 105 篇，分為《小雅》74 篇和《大雅》31 篇，合稱二《雅》；而《頌》分為三部分，分別為《周頌》31 篇、《魯頌》4 篇和《商頌》5 篇，共 40 篇。二《雅》及三《頌》兩部分詩篇總數達 145 篇，篇幅佔整部《詩經》的一半以上。

（一）《雅》《頌》的創作年代與內容

夏傳才在《詩經研究史概要》中，提出研讀《詩經》有三個基本概念：第一，《詩經》不是一部經書，而是最古的一部詩歌選集；第二，《詩經》不是一人的創作，也不是一時一人所編集，它是約五百年長的時

① “笙詩”大概是指以樂器笙吹奏的樂曲，說見北宋朱熹《詩集傳》：“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南宋〕朱熹集注：《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109 頁。〕

期中的集體創作，並在更長的時期中，經過無數人的採錄、輯集和不斷加工；第三，古人對《詩經》的許多注疏像重重疊疊的瓦礫，掩埋了這些詩篇的真正意義。^① 正因《詩經》是選輯不同時、地、人的詩篇，其來源甚為複雜，每首詩的撰寫背景不盡相同，部分至今更已無從稽考，加上歷代種種主觀或客觀的因素，後代用《詩》者及解《詩》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引申與比附，後人於研讀《詩經》時倍感困難。

要正確認識《詩經》所收詩篇的內容，必須於其創作年代具有充分的瞭解，現今研究者的基本共識是，此三百多篇詩並非一時一地一人所作，乃是採集自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詩篇。至於詩篇的具體年代，前人亦曾做過若干的探索與研究，多以為《周頌》詩篇於整部《詩經》中年代最早，大概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年代相對較早的尚有《大雅》，大部分均產生於西周前半期，但也有少數是西周晚期厲、宣、幽三代創作的詩篇，《小雅》則基本上是西周晚期的作品。三《頌》中的《魯頌》和《商頌》年代遠比《周頌》為晚。過去學者大多以為《魯頌》四篇均出於同一作者，《序》則以為《魯頌》均是“頌僖公”，魯僖公是春秋時期魯國第十八任君主，有可能是春秋中期的作品，乃史克或奚斯所作。^②

^①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增注本），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2—4頁。

^② 有關《魯頌》的作者問題，史克之說大致出於古文經學家，如《鄭·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穎達《疏》曰：“‘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為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見《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627—1628頁。）此外，孔穎達亦嘗引魏王肅之言曰：“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毛詩正義》，1625頁。）《魯頌》為奚斯所作說出於今文經學家，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云：“史克作《頌》，惟見《毛序》，他無可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為奚斯作。”（〔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62頁。）東漢班固嘗提出奚斯作《魯頌》之說，《兩都賦》云：“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22頁。）又《後漢書·張曹鄭列傳》云：“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1203頁。）

《商頌》創作時代的爭議則較大，過去有所謂商詩及宋詩二說。商詩說出於古文學派，以為《商頌》是商代作品，《那·序》嘗言：“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①其依據大致來自《國語·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②之記載；至於宋詩說為漢代今文魯、齊、韓三家詩所主張，大致認為正考父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宋乃商的後裔，魯《詩》嘗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頌》。”齊《詩》：“商，宋詩也。”韓《詩》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③千載以來，商詩說及宋詩說的論辯甚為激烈，隨着今古文經之爭，兩派主張於各代多處於此消彼長的狀態，直至王國維撰《說商頌》上、下篇，對詩篇內容做重新探究，結合殷墟契文資料，證明《商頌》並非商代作品，見解精闢獨到，其觀點為現代許多學者所採納。^④

就內容而言，二《雅》的內容包括敘述民族歷史、戰爭巡狩、追孝祭祀、頌美時王、燕饗朝會、政治國事等。《大雅》有不少是周民族的歷史詩，如《生民》敘述周族始祖后稷誕生與發明耕種，《公劉》記周族歷代從東到西的長期遷徙，以及公劉一代定居邠州的情況，《麟》描述古公亶父從邠州南遷岐山定居，《皇矣》描寫文王奉上帝之命開疆拓土及建國功業，《文王》歌頌周文王敬天修德，儆戒子孫需效法其德行，勤勉於政事，《大明》追溯文王、王季諸祖妣的盛德，並以武王於姜太公輔佐下滅殷之史事作結。二《雅》亦有不少描述戰爭及巡狩的詩篇，主要屬周宣王時期的作品，如《常武》《江漢》寫宣王平定淮夷的戰爭，《采薇》出

^① 《毛詩正義》，1684 頁。

^② [清]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205 頁。

^③ 《詩三家義集疏》，1089 頁。

^④ 王國維：《說商頌上、下》，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113—118 頁。

車》《六月》為記錄宣王平定北方玁狁之詩，《采芑》記宣王南征荆蠻。再者，二《雅》有不少祭祀詩，祭祀先祖或向諸神祈福，亦記祭禮的情況，如《下武》《雲漢》《旱麓》《既醉》等。至於農事詩則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當中有藉禮的載述。二《雅》有不少詩是以稱美時王功業為主，如《斯干》《無羊》《靈臺》《洞酌》等。至於宴會詩通常是描述燕饗朝會上主客盡歡之情況，如《鹿鳴》記述主人宴客之殷勤，並對客人加以頌讚，《伐木》《常棣》《行葦》《頤弁》均為周王朝的兄弟宗族宴會詩，強調兄弟親族團結一致，鞏固家邦，《賓之初筵》寫燕射、醉酒的情況。

從上述各詩可見，二《雅》大部分詩篇均描述西周國富兵強，並以此贊揚其太平盛世，以及統治者之美德；不過，末期周室中衰，厲、宣、幽三代朝政腐敗，甚至明顯呈現西周即將滅亡的徵象，西周晚期衰落的政治局面亦反映於二《雅》的詩篇中，可視為政治諷刺詩，較著名的例子包括《民勞》《板》《蕩》《抑》《桑柔》《節南山》《召旻》等，《詩大序》稱此類詩篇為“變《雅》”。

至於三《頌》，《周頌》諸篇多記西周初年史事，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均是宗廟祭祀文王之詩，《時邁》乃武王巡守各諸侯國與祭祀山川的樂歌，《噫嘻》為成王春天舉行藉田禮，告誡農官勤於農事之詩，《載見》是諸侯來朝助祭武王之詩，《大武》樂章大概包括《武》《酌》《桓》《賚》《般》等詩，均為武王克商之頌詩，而《閟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乃記成王之事。此外，據《序》所言，《魯頌》四篇作品大致均是歌頌魯侯之詩，^①

^① 例如，《嗣·序》云：“《嗣》，頌僖公也。”（《毛詩正義》，1627頁。）又《有駒·序》云：“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毛詩正義》，1638頁。）“《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毛詩正義》，1642頁。）《閨宮·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毛詩正義》，1655頁。）但是，過去亦有學者否定《魯頌》全為歌頌魯僖公之說，當中較具爭議的是《閨宮》，該詩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之語，《孟子·滕文公上》云：“《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孟子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77頁。）又《滕文公下》云：“《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注疏》，211頁。）《孟子》指出《閨宮》乃美周公之詩，部分經學家如翟灝《孟子考異》及陳奂《詩毛氏傳疏》從之。

《駉》通過寫馬稱頌當時畜牧繁盛，生產發達，《泮水》記魯侯戰勝淮夷後在泮宮慶功受賜，《有駚》記魯侯在祈年後的燕飲活動，君臣上下同樂，《閟宮》載征服淮夷後大修祖廟。至於《商頌》祇有五篇，內容大致是記載商族歷史及歌頌先祖之作，如《那》、《烈祖》是商族子孫的祭祖詩，《玄鳥》乃祭祀殷高宗武丁的頌歌，《長發》是歌頌商族祖先的詩，《殷武》通過寢廟落成舉行的祭典，極力頌揚先祖的盛德。

（二）《雅》《頌》與“詩六義”

“詩六義”是指《詩經》的“風”“雅”“頌”“賦”“比”“興”，其分類最早是由《周禮·大司徒》提出，但次序與今日所見者稍異：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①

類似記載亦見《詩大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②《詩大序》更對“詩六義”的具體內涵逐一闡釋，並將儒家的《詩》教理論與六義做出聯繫。然而，由於“風”“雅”“頌”與“賦”“比”“興”在性質上有所差異，自唐孔穎達提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③，其後的研究者多採“三體三用”之說，宋鄭樵云：“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④“風”“雅”“頌”大概乃指《詩》的三種體裁，“賦”“比”“興”則是

^① 《周禮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717頁。

^② 《毛詩正義》，13頁。

^③ 《毛詩正義》，14頁。

^④ [南宋]鄭樵：《六經奧論》，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3,11頁。

《詩》的三種表現方法。

有關《雅》之義，過去經學家多有異說，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王政說，見於《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①毛《詩》訓“雅”為“正”，即“政”也，“雅”乃指政事，因政事有分大小，故有《大雅》與《小雅》之分。此外，亦有經學家以為“雅”即樂歌，如朱熹《詩集傳》云：“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②《雅》大致是“正樂之歌”，二《雅》的區分在於《小雅》是燕饗所奏之樂歌，《大雅》則是諸侯或群臣朝會上之樂歌，南宋王質《詩總聞》在此基礎上提出：“雅，樂歌名也。”^③鄭樵《通志·總序》亦云：“朝廷之音曰雅。”^④朱熹認為大、小雅的音樂有別，唐代孔穎達《五經正義》其實已有類似說法，其於“雅”的解釋雖仍沿襲毛《詩》，按王政大小區分二《雅》，“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但是，孔氏卻又進一步指出“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因政事之大小而有大體、小體之分，詩體的不同反映於音樂上：“詩體既異，樂音亦殊”。^⑤孔、朱二氏見解影響甚鉅，後代《詩經》研究者多從音樂之異探求二《雅》之別，南宋程大昌《考古編》云：“音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⑥鄭樵《六經奧論》云：“《小雅》《大雅》者，特隨

① 《毛詩正義》，20 頁。

② 《詩集傳》，99 頁。

③ [南宋]王質：《詩總聞》，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9,1 頁。

④ [南宋]鄭樵：《通志》，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總序”，10 頁。

⑤ 《毛詩正義》，20—21 頁。

⑥ [南宋]程大昌：《考古編》，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1,2 頁。

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有其別也。”^①此外，在音樂說的基礎上，明陸深復以為“雅”是一種樂器，《雅》乃取義於樂器之名：“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筦曰小雅筦，有鐘曰頌鐘。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為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②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從之，指出“愚意樂器中有所謂雅者”^③，晚清章太炎《大疋小疋說上》更認為“雅”即古書所載之樂器“疋”：“凡《樂》言疋者有二焉。一曰大小疋，再曰春牘應雅。雅亦疋也。”^④又《大疋小疋說下》云：“大小疋者，其初秦聲烏烏，雖文以節族，不變其名，作疋者非其本也。”^⑤另一較具影響力的說法是將《雅》解釋為“夏”，乃詩篇產生的地域標誌，如梁啟超《釋“四詩”名義》曾提出“中原正聲”之說：“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樂，當時謂之正聲，故名曰雅。……‘雅’與‘夏’古字相通。……《說文》：‘夏，中國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猶言‘中原正聲’云爾。”^⑥又孫作雲《說雅》云：“我以為西周之所以稱雅，是因為西周王畿原來是夏人的故地，而‘夏’字亦可寫作‘雅’，因此稱西周詩為‘雅’。……總之，西周詩之所以稱‘雅’者，原本於‘夏’，以地為名，猶如十五《國風》各以地名作區別一樣。”^⑦高亨《詩

① 《六經奧論》，卷3，9頁。

② [明]陸深：《儀山外集》，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22，7頁。

③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首，11頁。

④ 章太炎：《大疋小疋說上》，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3頁。

⑤ 章太炎：《大疋小疋說下》，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4頁。

⑥ 梁啟超：《周秦時代之美文·附釋“四詩”名義》，見《梁啟超全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4387頁。

⑦ 孫作雲：《說雅》，見《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336頁。

經今注》的見解亦大致相類：“因為西周王畿，周人也稱為夏，所以《詩經》的編輯者用夏字來標西周王畿的詩。”^①

至於“頌”之義，前人的意見甚為分歧，最早的是《詩大序》提出的頌讚美德之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②“頌”有讚頌之意，乃將先祖之功德告諸神明，鄭玄《周頌譜》從其說：“《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治之詩。”又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③《頌》既為歌頌先祖而作，與祭祀關係密切，多詠唱於宗廟，故有經學家以為《頌》為宗廟樂歌，東漢蔡邕《獨斷》云：“宗廟所歌詩之別名，……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④南宋朱熹《詩集傳》亦云：“頌者，宗廟之樂歌。”^⑤又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云：“宗廟之音曰《頌》”，《樂略》亦曰：“陳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⑥此外，“頌”於古書中多通作“容”，如東漢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頌，容也，敘說其成功之形容也。”清畢沅注：“古容兒之容亦作頌。”^⑦大概由於《頌》之詩篇合詩、樂、舞於一體，清中葉阮元遂據此以為“容”是指“舞容”，《頌》有舞容，此乃有別於《風》《雅》之處。《擎經室集·釋頌》云：

“頌”之訓為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即“容”字也。故《說文》：“頌，兒也。从貢公聲。籀文作

^① 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頁。

^② 《毛詩正義》，21頁。

^③ 《毛詩正義》，1494—1495頁。

^④ [東漢]蔡邕：《獨斷》，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上，17—18頁。

^⑤ 《詩集傳》，223頁。

^⑥ 《通志》，卷75，2頁。

^⑦ [清]畢沅：《釋名疏證》，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4，3頁。

額。”是“容”即“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即善爲容也。“容、養、羨”一聲之轉，古籍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始於《唐韻》，即“容”字轉聲所借之“羨”字。不知何時再加“才”旁以別之，而後人遂絕不知從“頌、容、羨”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①

晚清學者劉師培同意阮元的觀點，明確指出“其說均確”，並云：“惟頌訓爲容，由於頌備樂舞，古人樂舞以降神，故三《頌》均多祀神之作；此則阮氏所未析也。”^②除此之外，與《雅》相同的是，部分經學家認爲《頌》乃樂器，清楊名時《詩經劄記》嘗引文貞公語指出“庸”即“頌”，疑與《禮》書所記的“頌磬”有關：“文貞公謂：‘庸’即‘頌’也。頌鐘頌磬與歌聲應，直言‘頌’，重人聲也。”^③金鶚《求古錄禮說·釋庸》更進一步指出古“鏞”“庸”通，“頌”又通“庸”，故“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頌古容字，與庸同聲，故通用”。^④張西堂《詩經六論》復引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按凡大鐘曰鏞”一語爲證，說明“頌”與“鏞”通，即大鐘。^⑤

^①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釋頌》，見《肇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8—22頁。

^② 劉師培：《舞法起于祀神考》，見《左盦外集》（《劉申叔先生遺書》）（三），臺北：大新書局，1965年，1886—1887頁。

^③ [清]楊名時：《詩經劄記》，見《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6頁。

^④ [清]金鶚：《求古錄禮說·釋庸》，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15.5頁。

^⑤ 張西堂：《詩經的體制》，見《詩經六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98—115頁。